

# 扒了你的皮

## 农民意识与小市民意识



漫画插图版



### 蔓延在中国社会民众意识中的两种流行病毒

自私自利的农民意识，藏污纳垢的小市民意识，最后汇集成令人反胃的种种状态：阿谀奉承、幸灾乐祸、贪小便宜、损人利己、张长李短、落井下石、见利忘义、嫉妒成性、奴颜媚骨、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绊子……

农民意识与小市民意识，正如两种贻害无穷而又异常顽固的病毒，它们不仅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极大地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由此而来的虚假丑恶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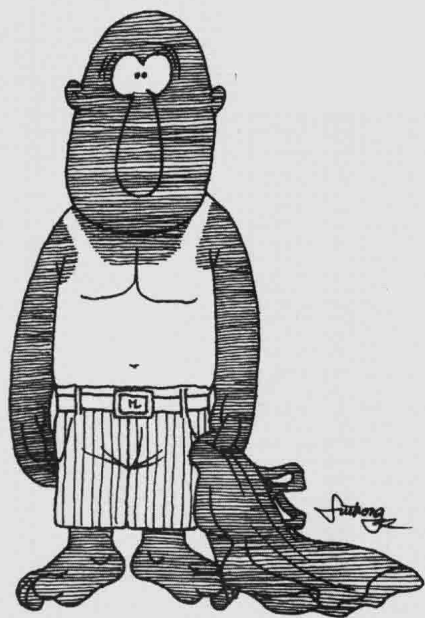
赵中月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蔓延在中国社会民众意识中的两种流行病毒  
农民意识与小市民意识

# 扒了你的皮

赵中月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扒了你的皮：农民意识与小市民意识 / 赵中月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5004-4057-X

I. 扒... II. 赵... III. 市民—意识—分析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422 号

责任编辑：胡 靖

特约编辑：苗欣宇

责任校对：苗欣宇

封面设计：鲁洋志

责任印制：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19.8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苗欣宇

大概是20年前，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刚刚走出社会混乱的阴影、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国外。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政府代表团，或者说是以“公出”的名义组成的“出境旅行团”，因为在当时还很少有人能自费出国。这样想象的直接结果是，这个团的组成人员都是我们某一级政府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其中也可能有政府比较看重的人物，比如国营企业的经理或者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等等，反正都不是没有来头的平民百姓。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团出访了一次美国，那个在几年前还与我们是“敌对”关系的国家。

出访的结果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大开了眼界，甚至带回了一大堆疑问：不是说那里的人民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么，不是说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么，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制度要比他们优越多少多少档次么，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车水马龙的一片繁华景象？

应该注意的是，作为我们国家的基层干部和中坚力量都

面临着这样的疑问。我不知道，占社会中大多数的百姓们是不是真正地认识了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度，当时甚至再以前，我们口口声声还要解放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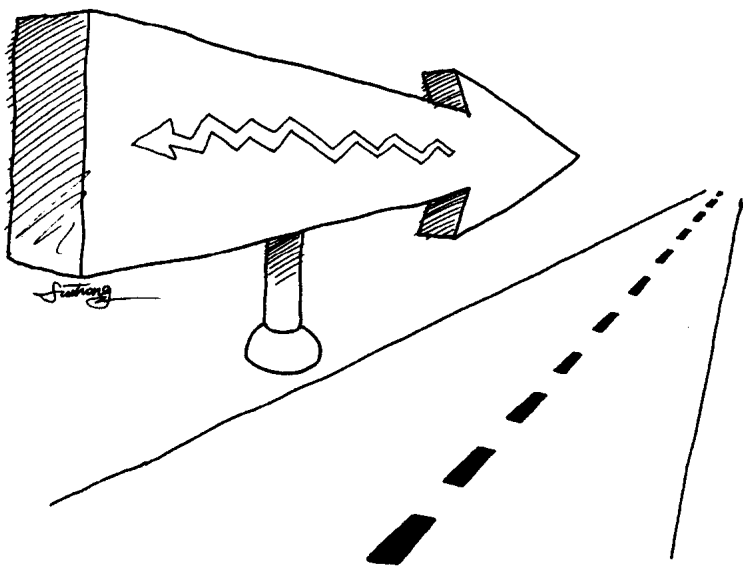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终于开始为过去社会民众意识中的种种错误还债了，还债的方式是我们撕下了我们自以为是的新皇帝的新装，开始正视自己的衣衫褴褛，开始反思我们贫困的事实与其根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它直接承认了我们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也直接指出我们长期以来的意识偏差。我们只有撕开我们意识中的层层看似冠冕堂皇的外衣，才能看到虚弱的自己。

但是，我们有谁能真正敢于直面自己？我们总是对别人说“不”，不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不”，更不愿自己对自己说“不”。其原因还是在内心中，我们以华而不实为美，种种表面上光鲜的东西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可以炫耀的资本；同样的，在面对着自己的丑陋和龌龊的时候，我们总会找到更丑陋和更龌龊的与之相比，从而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这就好像穿上了一件虚拟的衣服，在自我陶醉的同时还要让别人说上两句好听的，只有听到了才高兴，才满足，就好像那些出访的“社会精英”们，只有看到美国人民沿街乞讨、看到他们被资本家剥削才感觉正常。

撕下自己虚伪的外衣、亮出虚弱的自己，这不是只有伟人和强大的政党才能做的事情。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清理我们意识中的毒素，让我们更接近自己，就像蚕不经过破茧而出，永远只是丑陋的虫子一样。这个过程并不痛苦。就像我们面对死亡时，恐惧的不是死本身，而是“怕死”的“怕”字。

我们没有谁真正敢撕下了自己虚伪的衣服——它阻碍着我们的自由行动，甚至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我们的意识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障碍？可以肯定的是，农民意识和小市民意识，现在已经成为侵蚀我们社会民众意识的两种病毒，它们的传染性之强，不在于它们占据了多大的地方，也不在于它们影响了多少人的道德标准，更让我们害怕的，是它们不仅仅在意识领域里作怪，甚至它们已经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兴风作浪，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毒瘤。

先说说农民意识。



中国向来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即使现在，仍然有十亿农民耕作在田间地头。虽然近20年的发展，我们努力地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但是

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建国时我国的总人口是4亿，即使这些人都是农业人口的话，我们现在的农民也是在50年之内增长了1.5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依然改变不了“农业大国”的现状。更何況，与农业人口成倍增长相对的是，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却远远没有同样的速度。

农业人口在增长，或者说农业生产的比重依然很大，留给我们的难题就不仅仅是吃饭那么简单，而是农民意识从根本上得不到转变。

农民意识直接体现在农民的行为上，保守、封闭、自私、狭隘，面对困难的时候期盼青天，而从不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每一次农业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他们也要思虑再三，没有见到实际的利益之前，他们是万万不敢碰的，因为这种试验往往会让他们一年的辛勤劳作化为泡影。这也给人们另一个感觉，那就是农民愚昧落后、没有文化。

作为记者，笔者曾参加了东北某省的一次扶贫活动，随着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员去了一趟农村，亲身感受了“农民意识”刻在农民身上的烙印。值得注意的两点是，第一，这次去的地点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的农村当然也属于比较典型的贫困村；第二，因疾病、地质条件、劳动力不足等造成的贫困毕竟是特例，是一家一户的现象，而“贫困村”则是一个区域内的普遍现象。前者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城市，谁家有个长年无法劳动的病人也肯定“富裕”不到哪里去，而后的贫困原因则耐人寻味；第三，去农村“扶贫”的一行人由省政府在各个部门抽调的人员组成，陪同的有当地的领导干部，也就是说，在农民的眼里，这些人很可能就是

“官”，甚至就代表了“国家”。

我们去的一个“点”是当地农村的一个有名的困难户，一家四口，夫妻俩正值壮年，大儿子二十出头，小女儿将满十九，用农村的标准看这四个人都是劳力。看到“城里人”的大队人马来到他们家，男主人仿佛有些不快，用略带警惕的眼神打量着每一个人。当地的干部说，“这是省里的领导来了”，没有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惊讶和欢喜，他的脸上什么都没有，只是干笑了两声，转身往家里走，这就是邀请的动作了。

屋子不太大，很多人都没进去，我随同几个主要干部进去坐了一会儿。男女主人的脸上显露出很尴尬的神情，他们吃不准这一大堆人是来干什么的，或许他们正在盘算着去邻居家捉一只母鸡够不够这些人吃的。

当地的干部一再说，“省里的领导给咱们解决实际问题来了！”男女主人还是疑惑地扫视着每一个人。我们中的一个基层干部看出他们的不安，连忙招呼工作人员将“扶贫”物资卸下车。这次活动每户将分到一百斤大米、一袋化肥和一些优质种子，这在“城里人”心目中并不丰厚的东西对贫困农民来讲是很珍贵的。

看到一袋袋的东西搬进了屋子，男主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不停地撮着手，用这种最朴实的方式显示着自己的喜悦。招呼女主人倒水让座之后，他的眼睛开始往屋子的四角看，突然他像想起来什么似的，也不知对谁说，“我出去一趟。”说着扛着那袋化肥出去了。

大家没在意，继续和女主人聊天，收成啊、劳力啊、税收啊、水电费啊等等。他的小屋子里当然也装不下这么多人，





于是除了主要的领导，大部分人都从房子里退出来，站在门外。这时，就见那男主人飞快地从远处跑来，跑到近前我们才发现，他一手攥着一瓶白酒。他喘着粗气说，“农家人，没什么好招待的，都留下喝酒吧，先别走，我这就去抓鸡。”说着还从口袋里掏出盒不错的烟来，粗壮的手指动作夸张地撕开包装，要敬烟。

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我们想知道的是，那袋化肥哪里去了。

谁也不会吸他的烟，也不可能留下来吃饭。面对他，我们甚至无话可说，只好一次次地告诉他，大米可别卖掉了，这起码是口粮啊。问他还有什么困难，男主人挤眉弄眼了好半天，说，“那我们还没菜呢。”

回去的路上谁也没议论这件事，但是这个农民的形象谁也忘不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民的形象：保守，对外来的人有戒心，见到利益摆在眼前才会真正相信，企盼“上边”的帮助，更可怕的，是那代表未来利益的化肥永远比不上满足眼下的欲望，即使是吃一顿好的。当他们吃到“扶贫”的甜头之后，竟然会认为以这种方式可以得到更多更大的甜头……回到省城之后的总结会上，领导总结说，“我们不要只想着物质上的扶贫，更多的是要进行精神扶贫。”

精神扶贫，意思就是说农民的精神太贫穷了，说到底，是一种农民意识造成的愚昧和落后。

这件事在后来被传扬开，一部分人叹息着说，唉，农民就是农民，农民意识啊……一部分人是愤怒，说，帮这样的人干什么？更多的人却是把这当笑话，笑话的当然是农民。言外之意，农民是扶不起来的，他们只能面对着城市做出眼

巴巴的乞讨姿态，而这，城里人帮不帮你还不一定呢。

农民意识就这样被定格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对农民的种种不屑和鄙视都是来源于他们的这种“农民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农民意识”的说法，是以都市为参照系的，也就是说，没有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标准下生发出来的思想意识，所谓农民意识是不存在的。但是问题在于，都市的文化领跑者地位和农民的文化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都市生活的多变性和时尚性与农村生活的单一造成了反差，而都市信息的丰富又造成了都市思想的多元化，这又与农民意识中的保守和狭隘产生了矛盾。毫无疑问，社会变革的力量来源于都市，都市代表了先进的方向，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农村，在这种参照之下只能显得落后，甚至成为羁绊发展的绊脚石。

我们对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评价，都要基于客观和尊重两方面的前提，前者能保证结论的方向不至于偏颇甚至歪曲，后者则能保证我们结论的正确性和深刻程度。生于都市的人们，从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上的优越性出发，在此基础上的对农民意识的评价，都是带有居高临下的潜意识和批判甚至侮辱的心理上风的。如果我们能从客观和尊重两个前提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更公允。

农民意识自然有它保守的一方面，但是这不是罪恶的源泉。每一个学过物理的人都会遇到一个很难解释的概念——加速度。对这个概念比较形象的解释是，一个人每个月往银行里存钱，第二个月比第一个月多存10%，第三个月比第二个月多11%，之后每个月多1%，那么我们说加速度在加快。如果第三个月比第二个月多存9%，之后每个月少1%，那么



我们说加速度在减慢，可是即使这样，在10个月内，往银行里的存的钱永远也要比第一个月多。农民意识的危害不在速度上，而是在加速度上，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但是它能阻碍社会发展的速度。

农民意识是农业社会里的一种特有产物，和封建社会中产生的皇权思想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从都市的视角出发，如果我们将农民意识放在田间地头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落后、保守甚至愚昧得可笑的东西，在那一片只有庄稼和气候因素的领域里再正常不过。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中国的农业人口不是减少了，而是成倍地增长着，也可以说，农民意识的根基至少在人数上是越来越强大的，除去少数沿海的和制造业与都市保持相对一致的富裕农村，那么在中国农村的这片天地里，至少还有八九亿的农民在靠着他们这种“农民意识”生存耕作着。

在农村，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相对单一，在文化信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还将继



续,而它生发出来的农民意识也还要在农村的天地里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都市文化和思想的冲击,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就不平等的参照,我们是否还有探讨农民意识的必要?也就是说,在大家的视野里都只有黑白两色的话,关于彩色和黑白哪个更绚丽的探讨根本就没必要,如果狗的视野里能看见黑白两色,那么关于人和狗谁更高级的探讨则更无聊。

## 二

可是,正像罗大佑在十年前所说的,“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究竟是谁让我们本来能欣赏五颜六色的眼睛,现在却不能辨别黑白?

或许我们现在有必要谈谈更为恶毒的城市流毒——小市民意识。

大多数农民保守、狭隘,他们的行为和言谈让我们感到愚昧和落后,这是站在文化高处俯视低处时的必然结论,但是,这种结论是不应该掺杂道德层面的诟病和尊严上的攻击的。对一个正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结构转型的国家来说,农民的地位肯定处于社会最底层,因为他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也不掌握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更何况,他们还在潜意识里拒绝参与社会变革,不希望自己成为改革的先行者。

社会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多地将个人成功的标准用经济标尺来衡量,农业经济的缓慢、单一以及现在越来越明显的

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让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社会的底层，因为在同样的人力物力资源下，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他们创造的财富必然是最少的。而用都市的经济标准来衡量，农民显然不具备与市民抗衡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社会在变革，我们在努力地“与国际接轨”，我们不能为了某一个社会群体停止前进的步伐。任何的社会变革都要以强大的思想意识变革为先导，并要依靠它强大的精神力量做后盾。我们不能把所有思想意识的变革都当成成功的阶梯，它们泥沙俱下，甚至还嚣张地开出罪恶的花来。农民处于社会经济的从属地位，但是在都市中，在我们肆意骂别人“你是个农民”或者“你连个农民都不如”的潜意识中，他们又何尝不是处于道德和尊严的底层？

当我们将农民意识的种种表象当成我们高高在上的资本，当我们将农民踩在脚下进行道德上的攻击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小市民意识这种都市里最流行的病毒，已经污染了我们最需要的道德和灵魂，而这种道德上的恶之花，又将引导我们向何处去？

肆意的伪道德标准与没有道德的野兽行为是一般无二的，这与全副武装的士兵对一个弱小的孩子炫耀武力一样，是最丧失人性的。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从来没有形成市民阶层，即使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中，虽然经历过不同形态的政权更迭，虽然也曾有过当时的国际化都市，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市民。在城里生活的，大部分是权贵，他们的本质是与农民对立的地主而不是市民；还有一部分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的生活也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剩下

的一小部分就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没有自足的经济地位，农业经济社会形态下产生的知识分子的人身依附性，注定他们没有市民阶层需要的独立人格。

一个社会群体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必要的条件是他们有完全的经济自足地位，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物流的条件和市场都是成熟的。另一点就是他们必须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不依附任何阶层而独立生存，而且在此基础上，他们有属于自身的精神活动。

仅仅从这两点出发，中国就已经几乎找不到真正意义的市民了。我们有的，却是一群一群的小市民，以及主导着都市精神的小市民意识。

今天的“小市民”，既不同于历史上的市民，也不同于西方意义的市民。西方的市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品质，是主导工商业文明、开创现代化的主力军。而中国历史上的市民，是随着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技术、资本入侵而出现的，是典型的被压迫者，但因其力量太过弱小不能被视为一个阶层。此后，中国现代意义的工商业一直处于一种病态的发展中，市民的独立意志终于未能最后形成。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深入贯彻，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渐趋完善，市民一方面在数量上壮大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其话语能力和对主流思潮的影响力迅速增强；另一方面，精神上却弱化为市场经济的工具，成为“俗”的代名词。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精神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表现在曾经盛极一时的种种流行思潮都遭遇了小市民意识的解构，这在经济、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领域都有独特的表现：经济上惟

利是图，对实用性经济理论理解透彻，并为整个社会提供操作示范；政治上回避现实苦难，以冷眼和调侃为手段将已然技术化的政治进一步变得“一点正经没有”；文化上“躲避崇高”，以为一切对崇高的张扬都是虚伪传统的改写本，要求文艺表现世俗化的生活理想，拒绝一切抽象的思想，崇尚平面化的生活，以对日常生活趣味的品尝代替文学艺术审美；日常生活惟钱论，所谓“有钱便是大爷”，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

小市民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

说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这是我们不可辩驳的事实，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承认我们的小市民意识的，原因何在？就像我们文章开头所说的，我们还是不愿意扒掉自己身上的皮，至少对自己下手时，我们没有这样的勇气。

除了产生农民意识的广大农村，以及貌似城市的那些经济文化根本不“达标”的落后地区，我们国家最有城市概念的代表就是上海了。上海在这一百年中、在整个中国的范围中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经济上的极度繁华和西方经济模式的基础，让上海人有理由成为中国第一批市民。

在19世纪30年代，上海就建成了远东第一高的建筑物，在现在的南京路上，当时叫四明储蓄大厦，简称国际饭店。即使到了现在，逛逛南京路、吃吃国际饭店也依然是内地人对上海的最近距离的接触。在当时，上海还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家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几千个座位全部都是沙发座，美国的放映机，美国的冷气设备，专门首映国外的电影，而且，它是在美国的商业部门注册，根本就不归中国政府管。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海的第一个电灯点亮的时候，也要比现在中国农村最后一个消灭电灯的地方早150年。

正如拉美社记者在2003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评价的，“20年代这条大街（指外滩）是上海的金融中心，它被认为是利物浦和曼哈顿的结合”。在这篇文章中还说：“上海拥有1600万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国主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还是太平洋亚洲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如此之高的评价彰显着上海的国际化大都市地位，但是，上海有没有与这种经济地位相等的市民精神？

在内地人的印象里，上海人有个恶习，那就是非常看不起乡下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国骂不同的是，上海人骂人很少涉及生殖器，而是骂人“猪猡”。

经济水平的高高在上带给上海人地位上的满足，他们可以将上海以外的人视为猪猡，视为低等而且又脏又臭的动物。一百年前，当我们的民族深受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的民众被列强奴役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称呼是什么？当年的切肤之痛让我们知道了没有尊严的滋味。然而现在，这种对人的尊严的诬蔑和高高在上的凌辱态度，却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上海人有理由自豪，也有理由满足，但就像做人要有傲骨却不能有傲气一样，任何人都没理由将满足当成凌辱人的资本，甚至以此再一次颐指气使地满足。

正如我们所说的，将农民踩在脚下进行道德层面的恶毒攻击的，是小市民的丑恶行径，那么，中国最有可能形成市民阶层的上海人，却将自己等同于小市民。或许有上海的朋友说，不就是一句骂人的话么，再说现在上海人也不这么说



了嘛。问题不在形式上的收敛和行为上的克制，而在于思想意识的本质内涵。

有人曾经总结出上海人的小市民意识的三种表现：

“门槛精”：是诸多上海人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小市民特征。发达的市场经济独领风骚于全国，受商业化的浸淫，上海人的群体人格自然就此刻上深深的烙印，商业精神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在人们的言行举止、日常的人际交往和生意买卖活动中，都在体现着精明求实的人格特质，沪语称之为“门槛精”。而一旦这种狡黠过了度，就会让相对憨厚愚直的人们特别反感，结果上海人处处不愿吃亏，爱占小便宜的“门槛精”，逐渐在包括上海人在内的全体国人心中定格为丑陋的小市民特征。不少上海人，至今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门槛精，得意于自己会掉枪花（顾左右而言他）、能耍滑头（虚伪狡诈）、会出风头（炫耀己长以博众誉）和卖弄小聪明，并视不精明者为蠢大、洋盘、猪头三、阿木林、十三点、拎勿清；或兜圈子骂别人为东南北（缺西，是沪语中骂人笨的词句）。更有甚者，上海人很喜欢骂外地人为“乡巴子”，连经济文化程度不低于上海的台港来客，都会被冠以“巴子”的美号。殊不知，自以为聪明的沪人在糟践他人（包括上海人自己）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丑陋、粗鄙和浅薄，统统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各管各”：是上海人另一个典型的小市民特征。大凡到外地边远省份的农场或农村“上山下乡”过的知青都很清楚，在依地缘而结成的各地“知青帮”中，松散的海派帮最能，彼此最不抱团。在打架群殴中，上海帮远不是东北帮、北京帮、天津帮或四川帮的对手，除了“门槛精”，不愿自己吃